

公众获取政府信息 理应无障碍

欲解“血荒” 先解“信任荒”

近日,一条求献血的微博在网上流转。一位名叫程云涛的父亲为身患白血病的3岁儿子手术用血,急得四处求血。医院也望血兴叹。而据媒体报道,这样的“艰难求血”正因许多地方血库紧张变得平常起来。

血为何“荒”?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为“无偿献血、有偿使用”这一采血机制。其实,这一机制并非中国特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呼吁医疗用血采用无偿献血原则,这既是一种高尚的奉献之举,也可以防止献血者在体检中隐瞒病史,保证血液卫生安全。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证明,依赖无偿献血完全可以满足用血需求。在法国,每年有50多万人接受输血,平均每天需8000人次献血才能满足需求;在香港,平均每天需要800人献血,才能满足1年内近24万个单位的血液需要。依靠无偿献血,他们已经做到了血库血量的自给自足。

是我们缺乏无偿献血的热情和认识?未必。程云涛儿子最终获得的宝贵献血,正来自他网上求救后志愿者伸出的援手。而在北京,90%以上的无偿献血来自街头流动采血点。有统计说,全国临床用血中,自愿无偿献血的比例高达99%。这些说明,“无偿献血”并非、或者不完全是“血荒”的障碍。

“血荒”的形成,其实更多缘于“信任荒”——供血机制欠缺透明,由此导致了信任缺失,阻挡了人们的献血热情。据一项网上调查的结果,83.8%的人表示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担心献血被牟利”。

正因此,各地为提高献血量而对“无偿献血”采取各种“暗补”政策——比如经济“利诱”,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对“无偿献血者”的补贴;比如“评优挂钩”,高校评优要参考学生的献血情况……然而,这些措施非但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和担忧,某种程度上还招致更多质疑,“血荒”依然发生。如果任由其发展,可能还会引发更恶果:因血液供应紧张而促使病人被迫想方设法求救命血,地下血液买卖借机死灰复燃,血头、血霸卷土重来,无偿献血机制受到损害。

“血荒”的解决之道,恐怕还在于尽快解好“信任之扣”,提高献血、供血全程的透明度。既要用公开事实向献血者证明,献血的程序会被严格遵守,献血的过程卫生健康;也要用更畅通的信息、更扎实的数据向用血者讲明白,无偿献血,在医院用血为何要交钱。

当前,我国的人口献血率8.7%,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这说明,我国无偿献血的潜力巨大。而要开发这种潜力,激发公众热情,唯有用公开透明的办法消除献血者的疑虑,无偿献血才能告别“血荒”。
尹世昌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2011年总资产113.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按此计算,商业银行去年平均每天赚约28.5亿元。(2月20日《新京报》)

银行业 令人咋舌的“暴利” 从何而来

银行业如此“暴利”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就在前不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陈永杰公开表示,“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据其计算,银行人均净利润竟然达到了工业企业的12倍。有银行行长曾经感叹:“银行利润太高了,都不好意思公布。”

这种令人咋舌的“暴利”因何而来?利差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我国对银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和管理制度,国有大型银行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以至于可以独享高额垄断利润。而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利差。据统计,仅强制性的存贷利率差,每年即可产生1万余亿元的利润,占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80%。

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分析,目前以手续费及佣金为主的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已经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获得的手续费收入才是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反观国内一些银行,目前依然靠“吃利差”过“肥日子”。这无论对社会经济还是自身发展,都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银行凭垄断之势“吃利息”,严重侵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比如在“4万亿救市计划”中,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往往借债无门,以至于很多中小企业被推向“高利贷”的深渊,或亏损倒闭,或发生前不久温州等地那样的“借贷危机”。此外,存贷款“息差”过高,也有变相盘剥储户之嫌,再加上银行花样繁多的“手续费”和“金融创新”项目,银行可谓“两头食利”。

安逸日子过久了,会助长国内银行的情性,谁还会想着业务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了,当国内银行在市场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我国一些银行依然对“吃利差”甘之如饴,这又该如何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促使国内银行走出“垄断——利差”的业务模式,以笔者之见,既要扶持民间金融,引入市场竞争;又要缩减利差,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激发银行业务创新的积极性。
薛世君

政府透明度被作为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价值指标进行研究和评价,今年社科院法学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以政府网站为研究对象,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主要内容,首次将26个省级政府透明度进行排名,结果是北京排在首位,获得及格分的仅有8个省份。这表明,政府透明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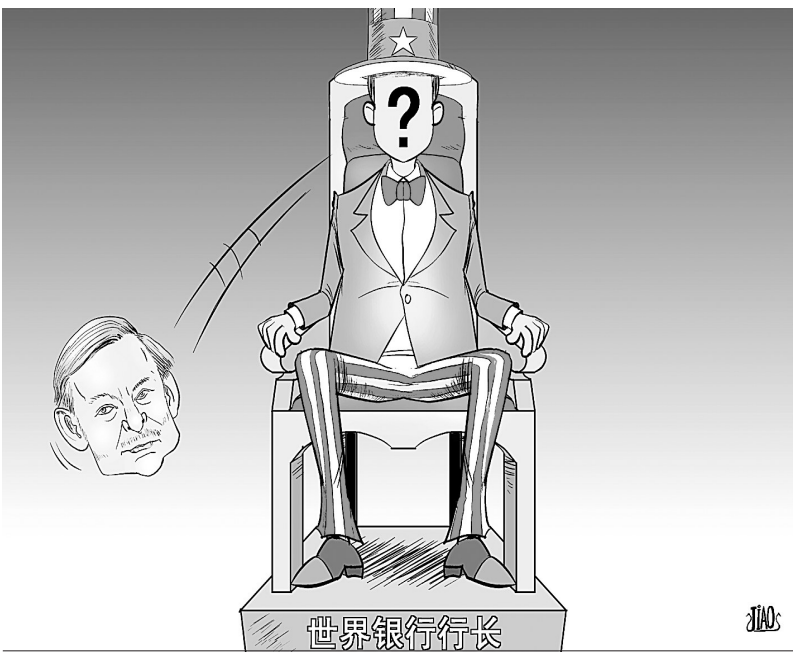
造成多个省级政府透明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存在诸多障碍。这种障碍首先在于,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过高,一些不必要的身份验证、资料提供等流程与环节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拦路虎。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应进一步细化目录设置、指南配备、报告编写等的标准,杜绝政府机关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随意行为,切中要害。

事实上,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对

造成多个省级政府透明度不高的原因,是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存在诸多障碍。这种障碍首先在于,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过高。

应的就是公众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政府信息。人为设障既不应该也不必要。诚然,有极个别的人为设障比如一些商业网站也经常要求输入“验证码”,防范的是一些恶意用户的网络攻击。但多余设置一些流程和环节,目的只是提高公众获取信息难度,让人们等得不耐烦或忌惮于身份信息泄露而放弃。

从实际情况看,人为设障远不止于此。比如,有的网站内容领导行踪多,履行职能信息少;有的网站目录建设状况不佳,信息链接的有效性较差;有的信息公开报告内容避重就轻,有的网站栏目还存在不能打开的状况。这种人为设障更为隐性,容易使人在浏览政府网站中中了无意趣而



变化不大

世行预计将在2012年4月20日世界春季会议时,就新行长的甄选达成共识。不过,即便发展中国家呼吁下一届世行行长甄选应遵循“择优和透明”的过程,但目前最有可能担任这一职位的仍是美国人。对于谁是佐利克继任者的猜测,目前集中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前财长萨默斯以及现任财长盖特纳身上。其中希拉里和盖特纳都曾表示,如果奥巴马连任成功,他们将不再谋求下一任期中的部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佐利克此次离职再次导致了对于世界金融结构领导人国籍问题的争议:在1945年,欧洲和美国之间达成默契协议:即所有世界银行行长都是美国人,而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均来自欧洲。
焦海洋/图

“一个病人7个支架” 对医改是个警示

然不错,但是,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官员,权力越大越要加强监管。这位心脏病患者住院花去十几万元,像这种高费用,不要说享受医保的工人,就是自费医疗的普通公务员也不能报销,必须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因此,废除官员医疗特权应该是医改的一个重点。

二是,治理过度医疗不能顾此失彼。提起过度医疗,我们就知道滥用抗生素,医生大处方,于是治理的办法是围绕用药做文章,一些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甚至出台规定,考核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现在看来,“过度用药”包括两方面,不仅有个“过度用药”问题,还有个“过度检查”问题,医院投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结果,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药品收入占比也就下降了,按下葫芦冒起瓢。因此,对“过度医疗”的监管不能顾此失彼,此消彼长。

三是,医院管理是医改永恒的主题。现在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体制,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应当看到,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不能用体制问题掩盖其他问题。而且,体制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医院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就以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为例,这是不能把责任推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之上的,而是暴露了医院管理混乱和医生道德沦丧的大问题。犹如一个小偷,他把偷盗归结为自己经济困难,现在更是在偷盗时杀人了,难道还能认为是经济困难造成的?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反面典型,这是一个把医改推进下去的好机会,请山东省、济南市的卫生主管部门把这个典型好好查一查,依法依规严处。
殷国安

认同裸官与反对财产申报 一个“调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根据调查,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处级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认可“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比例最低。(《京华时报》2月21日)

四成公职人员认可裸官,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心态和价值观,在笔者看来,这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遭遇强烈反对其实是一个“调调”,并不奇怪。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通过公开官员财产,实现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当前,我国“公开官员财产不承认只说只行动”,既有国外大量成

熟经验予以借鉴,又有国内相应实践进行支撑。然而,尽管舆论对此长期呼吁,看似“水到渠成”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官员财产申报之所以迟迟不能浮出水面,根子就在于官员群体的公开或不公开抵制。

当然,贪官毕竟是少数,多数都是“清清白白做事拥有合法财产的官员”。而反对财产申报的姿态,也未必就一定说明其财富来源带有“原罪”。但这种无谓的焦虑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诸多为官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真正明晰自己作为一个官员的应得之权利和该付出之义务。正如多次提交官员财产申报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所言,“相当一部分官员还未认识到公开财产是其义务”。

认同裸官,大抵也是如此。官员也有财产隐私权,与官员配偶也

失彼,此消彼长。

三是,医院管理是医改永恒的主题。现在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体制,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应当看到,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不能用体制问题掩盖其他问题。而且,体制问题也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医院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就以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为例,这是不能把责任推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之上的,而是暴露了医院管理混乱和医生道德沦丧的大问题。犹如一个小偷,他把偷盗归结为自己经济困难,现在更是在偷盗时杀人了,难道还能认为是经济困难造成的?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反面典型,这是一个把医改推进下去的好机会,请山东省、济南市的卫生主管部门把这个典型好好查一查,依法依规严处。
殷国安

拥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与官员个人的忠诚度没有直接关系,几乎是一种逻辑的不同阐释。

事实上,如果官员孤身在国内任职,不论有无腐败行为,本身都是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存在潜在的权力舞弊风险,其忠诚度怎么可能不受到质疑。追根溯源,这是一种权力伦理的缺失。权力伦理的缺失,导致权力掌握者对于自身权利和自身权利的边界模糊不清,从而滋生出一种另类的权力傲慢。

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为了确保公权不被滥用、不出现贪腐现象,接受公共监督和制度监控是必然的。而在这方面,我们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在太少——因此,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对裸官的监管,不能以公职人员认可不认可的意志为转移。
陈一舟

短短几年间,到过多个城市,做过多种工作,长的几个月,短的一星期……目前,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旅游式打工现象。“旅游”打工、打工旅游,到底有何不同?他们频繁更换工作为哪般?对个人、对社会、对企业有何影响?(2月20日《人民日报》)

“短工化”现象 是一种社会困境

审视这个问题,就是审视民生现实。考证一下可以得知,的确是有打工旅游的人。但正如他们中有人说的,他们就是为了旅游而打工,打工就是为了能走南闯北,“旅游”打工是要“给人生增加一些轨迹外的记忆”。譬如,某人迷上了自助游,大学阶段,他骑行过川藏线、滇藏线等线路。在川藏线上,他与同伴没线继续旅行,只好帮牧民放牧、做饭、干杂活换取食宿。选择打工旅游的,一般是都市白领、大学生群体。他们选择边旅游边打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的是山水之间的情怀抒发,为的是获得更多的体验。可以说,他们走的是休闲路线,打工是旅游的辅助而不是目的本身。

但是,民生语境中的打工,或曰“短工化”,迥异于上面语境中的浪漫情怀,那是严酷的现实,是紧迫的民生压力及压力之下的人对压力的自觉反应。那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旅游”打工,大多是他们在寻求更好的待遇和发展时,一种相对被动甚至无奈的选择,与“旅游”并无多大关联。如果对“短工化”现象做出这样的解读: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为满足个人兴趣,频繁更换工作城市和工种。“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这就是一种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说法。公平公正地说,打工者到处被欺骗,又申诉无门,是导致“短工化”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增大,是低权益、低工资、低福利带来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使是频繁的“跳槽者”,他们行为所显示的急切感,亦是为了早点找到工作和心理的归宿。

像都市白领、大学生群体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也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亦渴求人生愿望的实现。他们玩不起人生,他们的每一个“跳槽”步骤都有太多的辛酸和哀伤在里面。频繁地更换工作,不是他们有挑挑拣拣的偏好,而是他们的人生正处在迷茫的状态。如果在打工的单位挣得多、待遇好,何苦跑来跑去?

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已成普遍趋势,这是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亦是民生遇到的新情况。说到底,这是他们为生计所困,而不是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看问题,重要的是看清本质,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短工化”现象愈演愈烈,于个人、社会、企业皆有不利之因素,但受伤害最深的还是缺乏话语权的农民工群体。“短工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困境,公权力回应农民工的诉求,更多地解决诸如户籍制度、教育和医疗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让他们心有所依、身有所靠,可能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好办法。
今语

说得再好 也不如活得明白

据媒体报道,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于日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她受贿及非法所得款共计人民币89.1万元、西子花园住家一套(16.9万元)均被没收。参与调查的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尹春燕的悔过书是我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可以先来欣赏一下尹春燕的“文采”。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这是在悔过书的开头,尹春燕引用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她还写道:“……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我现在不仅是一心一意,而且心里被填满、愧疚自满……”

的确,从尹春燕的斐然“文采”中可以看出,她是读过一些书的,而且读了写出过《逻辑学讲义》、《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的康德。知法犯法,尹春燕最终倒在了权钱上,然而她意识到这一切时已经晚了。悔过书的“文采”,是她为自己的入生写下的另类意味的浓重一笔。

从尹春燕的“文采”中还可以看出,她的忏悔和反省有的只是对个人命运的悲伤和哀叹。不知“文采”的其他部分有无对造成她今日结局的现行体制的省思。从根本上说,她所显示的贪欲及带来的后果,既不能怨天也不能怨人,要怨只能怨自己。她是在悔罪时才懂得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减法”吗?个人的贪婪怎么就没理成章地被“减法”减掉?修身自好、独善其身,这些都属于生活逻辑的一部分,不看康德,仅看清官戏的戏词也能洞晓其意义。官之初,性不贪。官员的行政环境造成了“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尹春燕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从这点说,她被贪腐之力牵引,康德所言的判断力和实践理性,根本救不了她。她“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律”只是马后炮,体现的是她身上所具有的表演人格的悲剧性。

作为一个公权力的执掌者,“文采”再好也不如做人好,说得再好也不如活得明白。人生有无智慧,不在于花哨的“文采”,而在于思想支配下行为的正确。这样的话对今天的尹春燕来说都是无用的。仔细考量一下,她悔过书的“文采”,不过是些浮华空洞之物,它们既救不了她墮入深渊的灵魂,也影响或启示不了别人。
伊文